

邯郸路复旦大学校区以南，有几条以“国”字打头的南北向马路，自西向东，依次为国权路、国年路、国顺路、国福路、国达路（原国清路）和国定路。我曾有个设想，写一写这几条马路的前世今生，并为其个性化定位。例如，国权路最具历史感，故事也最多；国年路曾是教工宿舍主干道，人文风景最好；而国定路则富于现代气息，青年学生最喜欢——它曾被吟诵入诗，还被写进了歌曲。上海彩虹合唱团那首《张士超你昨天晚上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》，“凛冽的风，冰冷的雨，国定路的落叶满地，我已经冻得不行……”把国定路唱成了“网红”。

然而，当我把目光投向国福路时，却犯了难：它该如何定位呢？20年前，我曾住在政肃路上的复旦第十宿舍，小区垃圾箱房却设在国福路。除了去倒垃圾外，我不记得那时我是否从头到尾走过国福路。国福路既不车水马龙，也不四通八达，从邯郸路到政修路，全长仅300余米。那时，原本开在国福路的校园（复旦第九宿舍）大门早已移至国顺路，国福路显得内敛、幽静，与世无争。2005年，邯郸路成为中环线后，“前不着村”的国福路更加孤独、落寞。

查一下史料，国福路的资历倒不浅。它辟筑于1940年，以今邯郸路为界，分南北两段，南段路名“协议路西二街”（一说西三街），即今国福路段；北段名为“同化路西四街”，直达界浜浜（今复旦“本北高速”北侧）。所谓“协议”“同化”，实际上是日本占领军打着“日中协进”旗号，

行殖民之实。抗战胜利后，南北段路名沿用“大上海计划”路名命名原则，统称为“国福路”。上世纪50年代，复旦校区东扩，国福路北段融入校区，南段就成了最短的“国”字头马路之一。

国福路两旁，原是一片田野和沟渠。但在路西侧，却老早就有一幢欧式别墅，绿瓦黄墙，外形呈圆弧

国福路的个性

张国伟

形，俗称“绿屋”。1956年前后，复旦出资将其买下，作为陈望道校长寓所（底层设语言研究室），门牌号为“国福路51号”（以下简称“51号”）。一个难解之谜是，早年这一带荒无人烟，51号由何人建造？为何选址此地？它究竟建于哪一年？出于好奇，我曾多方打听，不得要领。几天前，老复旦子弟张业新先生告诉我，他曾听人说起，51号建于1930年，原为华兴铁工厂老板所有。华兴铁工厂位于其美路（今四平路）国权路口，1949年后更名为“国营上海机床附件厂”，至上世纪90年代拆除。张业新还透露说：“大概在1980年前后，我与江湾医院老职工张文炳路过国福路，他指着51号对我说，50年代初这里是‘血防站’（血吸虫病防治站），我曾经在这里上过班。”以上回忆，掀开了51号神秘面纱的一角。

51号北面，另有两幢结构相似的别墅，这是1956年杨西光书记主

政复旦时建造的，门牌号分别为“61号”和“65号”，专供从浙大调任复旦的数学家苏步青、陈建功先生分别居住。后来，陈建功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，65号一度空置，“文革”后期由生物学家谈家桢先生迁入。51号、61号、65号三幢别墅，从南到北，相互依存，原是校园一个独特地方，留下过不少佳话。据说，陈望道校长常在51号院子周围散步，有时见到苏步青副校长正在61号院子里赏花弄草，他会走过去聊天。有一次，他兴奋地向语言研究室的同事，他刚去向苏先生请教了一个数学问题——那时，他正在定稿出版跟数量有关的“单位词”的著作。

当年，复旦校园里小楼不少，但真正称得上“别墅”的，只有四幢。一幢在燕园（俗称“小红楼”，今已拆）；另外三幢，就是51号、61号和65号。多年后，随着主人去世或迁离，三幢别墅一度破旧不堪。2018年5月，修葺一新的51号作为《共产党宣言》展示馆正式开馆，各地参观者纷至沓来。一位复旦校友告诉我，他以前在校读书时，从未听说过国福路，是《共产党宣言》展示馆吸引他重返母校，踏足国福路。在建党100周年之际，经过修缮的61号苏步青旧居和65号谈家桢（陈建功）旧居，与51号一起，被定名为“爱国主义建筑群”，对公众开放。

从此，国福路不再寂寞。有了这个“爱国主义建筑群”，国福路纵然再低调，也可以与其他历史文化名街平起平坐。而对我来说，定位国福路的个性，也已不再是难事。

橘红色的背景一出现字幕，就让我们感受到了《八月处子》这部西班牙电影炎热的气氛。字幕说：“马德里人有习惯在夏天离开这座城市的传统，为了逃避炎热，城市往往变得空无一人，留在城市中的往往只有游客和心不在焉的访客，他们通常会聚集在受欢迎的露台舞会周围，时间一般是八月上旬。”市中心还会举办狂欢节，本片女主角伊娃，一个西班牙人，即将年满33岁，在节日的每个日夜，决定留在自己的城市，短期租借熟人的公寓，尝试过一种新的生活。

影片以日记体形式，在八月的头一天，就让公寓主人带着伊娃，巡视公寓新居：街上最古老的建筑，有七个阳台，通风采光好，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空调，但阳台上经典样式的百叶窗，可以遮挡灼热的阳光，也可以让屋子变得凉快一些。

这是一部反戏剧化的电影，当伊娃拖着行李，第二天搬进公寓时，几个长镜头会跟随她进屋、开窗；有时，她从画框外进入画面，坐在沙发上。摄影机也会一直跟着她，拍她购物、逛街，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；再回到公寓，搬花、吃葡萄、看书……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依然会发现，她漫游在马德里这座城市中，坐车游观市容、参观考古博物馆、躺在草地上读书、去酒吧喝酒、看街游、在河边野餐、广场看流星雨、听街头音乐……她探寻着城市的热烈和狂放，感受着城市的色彩和光线。

很显然，马德里对伊娃来说，实际上是熟悉的陌生者，她出生在郊区，在城市也无固定居所。她来这里，是度假？或者说，寻找什么人？寻找什么记忆？电影没有讲述一个戏剧性的故事，但散文化的随性叙事，使得我们在伊娃游览城市的过程中，也和她一起见证了偶然和必然，还有人和人之间的种种联系。她邂逅老朋友，又认识新朋友。在起先毫无目的的自由流荡后，她似乎由模糊而清晰，渐渐有了新的生活方向。

夏天的城市漫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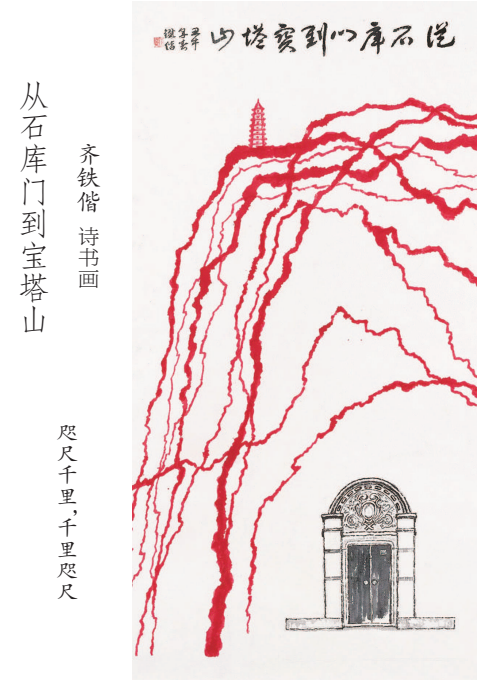
刘伟馨

伊娃的心理轨迹和情感变化，蕴藏在和所有人的聊天中。这应该算一部话痨电影，伊娃在博物馆遇见了老朋友路易斯，他们密集地聊着天。路易斯有点悲观，原来全职工作被解雇，成了自由职业者，靠写作稿费为生，女友又和他分手。他们聊着完美主义，伊娃说：“夏天最容易达到完美，也就是放松。”“夏天比任何时候都适合做你自己。”谈到约会，伊娃说：“我从来不后悔没有和别人约会过，但是和某人约会，我后悔了很多次。”说到害怕，路易斯说：“有时候害怕可能是好事，害怕受伤，害怕伤到别人，害怕搞砸。”在因钥匙原因被关在门外后，她半夜打电话给久不联系的老朋友索菲娅求救，索菲娅有一个儿子。她们聊的话题是：要好的朋友是否因为生了孩子而生分。伊娃和邻居、街头演唱者奥尔卡结识后，又和威尔士人

乔和英国人威尔玩在一起。乔来到马德里近十年，是英语老师，他说：“我父母还在威尔士，我不知道，我离开威尔士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，还是因为我离开了威尔士变成了现在的我。”在多个国家流浪的奥尔卡说：“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就像是重新开始，但我也很钦佩从未离开自己国家的人，他们有勇气在熟悉的环境里获得自由。”而伊娃恰恰是从未离开过的人。看似漫无边际的聊天，我们知道，伊娃在寻找“我是谁”“我要到哪里去”“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”。伊娃曾是一个演员，在电影院邂逅前男友，看似放松，实际激起心头波澜。在影片中她认识的最后一个人，是有着仪式感感的阿戈斯：白天上班，下班到高架桥抽一支烟，晚上到酒吧工作，和妻子分居，有着一女儿。伊娃从担心阿戈斯要跳河自杀开始和他交往，直到他们决定住在一起。在热闹的马德里街市，阿戈斯八岁的女儿对伊娃说：“阿戈斯说你怀孕了。”不是吗？八月，是孕育生命的浪漫季节，伊娃有了她自己新的开始。



读碟



从石库门到宝塔山

齐铁偕诗书画

编者按：七月，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，回望百年风华路，能走得更远、更持久的人，都是心中有信仰、永葆初心和使命的人。“十日谈”今起刊登一组《心中有信仰》，请作者从亲身经历出发，讲述中国共产党这盏明灯，如何给我们的前行增添无穷的力量。

1940年9月，当时我14岁，亲眼看见我哥哥被日寇无端殴打，姐姐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。面对凶残的侵略者，中华大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。上海军民、各校师生抗日热情日益高涨，我也在学校地下党的影响下，加入了党领导的抗日秘密外围组织——学生界抗日救国协会。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地下党秘密活动的开展，我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男孩名字——王炜翼。王是三横王，因为母亲姓王，是一位革命妈妈。炜是火字偏旁的炜，为什么要加个火呢？因为这团火象征着我燃烧的革命热情，象征着祖国伟大而光明的未来。至此，我立下誓言：我要用自己一颗小小的火苗，点燃千万颗爱国青年的心，燃起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，埋葬日本帝国主义。

之后，在参加一系列抗日活动和学习了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后，我得到了锻炼，思想得到了成长。我逐步意识到，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才能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。我按照地下党组织的要求，用秘密的形式，填写

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

王少普

满域阴霾，抬眼望，强敌伺迫。低首瞰，万家哀恸，一腔忧愤。览顾天下寻道奋，依兴业路群英索。共运飘、壮志赛长虹。卓绩霍。

血原沃，结硕果。心愿铁，争先踏。率亿万人民，伟大进扩。红旗飘扬天下获。歌声跃起彩霞火。改衰颜，万里锦妆新，东方烁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父亲晚年，无论在医院，还是护理院，逢人便说“我是老党员！”言语间流露的是一种自豪和满足。

是的，97岁的父亲，经历过新旧两种社会，跟党有着特别深的感情。他从小苦出身，放过羊跑过街，受过日本鬼子的罪，解放后日子才越过越好，晚年还住上了高楼，沉浸在绿树簇拥的美好环境中，感受着生活美如斯。

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，有65年党龄的父亲一直盼望着能亲眼见证这一伟大时刻，我们内心也总

父亲的心愿

何成钢

是在暗暗地祈祷着！可是，他老人家还是在春天离开了我们，不过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，父亲走前，已和我们平静地告别，并已经得知他将获得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，也是圆了他的心愿。

外甥特地从网上买来一本英国作家约翰·伯宁罕的《外公》给我二姐，说：“妈妈，我买这本书看，就会觉得外公一直陪伴着我们，活在我们的心中！”看

着这绘本，联想到父亲画的自传绘本，我们姐弟的内心得到了莫大的慰藉。

父亲曾与死神擦肩而过。电工、半导体、矿石机他样样会干，在单位是一个革新能手。1958年，母亲正怀着我，父亲与科发药厂几位技术骨干因公派援助一家制药厂，因离心机爆炸，当场一死二伤，父亲昏迷不醒，经六院抢救才得以脱险。

我最早阅读马列的书，是受的父亲影响。大概在初中的时候，他经常从单位里带回《马克思选集》《列宁选集》《毛主席哲学著作》和各种单行本理论书，还买回来杨国荣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周一良、吴于廑的《世界通史》、郭沫若的《中国史稿》等大部头书籍。有一次出差，他带回一本《中国地图册》，令我爱不释手，废寝忘食。我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，喜欢上了哲学、历史和地理知识，家里铺天盖地挂满了中国、欧洲、中南半岛、阿拉伯半岛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各式地图，连双人床上都用粗铅丝做成书架，以便躺下看地图，以至于还被请到松花新村向阳院，给星下围坐的居民讲地理知识哩。父亲是一个勤勉好学、乐于付出的人，加之有一手好字好画，特别招人喜爱。

父亲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。他关心政治，每晚必看《新闻联播》。新中

一张“空白”的入党申请书

诸詠芬

入了党申请书。因为时局的动乱，为了不被敌人发现，我按照要求，在一张白纸上沾上面粉加水调稀的液体，秘密书写了入党申请书，这种申请书干涸后看不到纸上的文字，阅读时需要用碘酒在纸上刷一遍才能识别。1942年8月27日，上级党组织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，从此，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。

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后，地下斗争环境更为险恶。一次，我开完会回来，路过虹口区海宁路口，看见有人在等8路有轨电车。汉奸质问他在干什么，那人回答：“在等8路。”汉奸听后，竟把他当成“八路军”抓了起来，足见当时形势之险恶。

那时我们既要防范日寇汉奸，又得提防国民党特务的抓捕。每当我外出执行任务时，随时随地都要注意身后有没有敌人跟踪。对上级下达的指示我们大多数不用笔录，而是牢记在脑海中，除非遇到一些重要内容，也只能采取打乱顺序的方式，分别写在书的不同页码上进行秘密传递。

因为工作需要，我常常要和其他地下党员接头。接头，对地下工作而言是一件极平

常又十分危险的事，稍有马虎就会造成党的损失。通常，我们会选择在某个党员家中碰头，我家就是联络点之一。每次接头前，在妈妈的帮助下，都事先设置安全警号，要么在窗玻璃上挂条手绢，要么在窗台上放盆花，一旦有危险就迅速扯下手绢或推下花盆，警告外面的同志赶快撤离。

有一次，同志们来我家接头，不巧遇上弟弟回家找书。接头的同志不认识我弟弟，以为出了情况，立马警觉起来，可抬头看我家窗台上是安全警号，又疑惑了起来。于是，他们让对面一家和我认识的小饭馆送了碗馄饨，如果我收下，则表明安全。如果我不收，则有异常情况。过了一会，我明白了他们的用意，下楼去接他们，这时大家才松了口气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

日月如梭，这么多年过去了。每每想起这些往事，仿佛就发生在眼前。在那些充满残酷斗争的忧患岁月里，我和同志们一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；我们努力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；在一次次面对白色恐怖的考验面前，我们义无反顾……只因为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共产党员；只因为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信念——建立新中国。

永志不忘，那夜，万人同唱《灯塔》。

十日谈

心中有信仰 责编：刘芳

中央给老党员颁发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，其实，父亲只是千千万万党员中最普通的一个，光荣在党，父亲是榜样，我们将把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。